



明代文学论集

下

主 编 陈庆元

副主编 王汉民 涂秀虹



海峡文艺出版社



小说研究

《永乐大典》平话探佚

○山东大学 袁世硕

明初纂修的《永乐大典》是一部特大型的百科全书式的类书。这部类书以韵统字，以字系事系文，博采古今图书、佚文秘典，无比繁富；现残存者约八百卷，仅为原帙的三十分之一强，引书约计已达万种。尤为可贵的是主持纂修的馆臣突破了传统的经籍、艺文观念，扩大了采录范围，收录了宋元通俗文艺作品。据清道光间杨尚文所刊《永乐大典目录》，“戏”字部“戏文”凡27卷，收宋元南戏《赵氏孤儿报冤仇》等33种；“剧”字部“杂剧”凡二十一卷，收元人杂剧《西厢记》等一百种（其中《十咏水仙子》、《愚鼓气息劝世道情》二目疑非杂剧）；“话”字部“评话”凡26卷，惜未列出作品名目，当为元代讲史话本平话。这表明宋元通俗文艺非常兴盛，供阅读之文本已蔚为大观，奉敕纂修《大典》的馆臣也不嫌其俚俗而鄙弃之，较之清代四库馆臣头脑很是开放的。

《四库全书总目》史部九杂史类存目三“《平播始末》”条注云：“按《永乐大典》有平话一门，所收至多，皆优人以前代轶事敷衍成文，而口说之。”谓“有平话一门”，当是指《永乐大典目录》所列26卷“评话”。四库馆臣得见《永乐大典》原帙，当是原作“平话”。今存元刊《全相平话》五种，是“平话”为元代刊行讲史类话本之专名，“平”为平说，只说不唱的意思。明人多称艺人说书或话本小说为评话，是以“平”为“评论”之义。杨尚文刊《永乐大典目录》的底本是转录的，作“评论”可能是误从明人的习语，《永乐大典》原非如此。

元刊杂剧现存者较少，幸赖明代有识之士如臧懋循等辑刊百余种传世，近世研究者得以识其辉煌的文学成就，成为中国文学史、戏曲史上重

要的篇章。宋元南戏、平话便没有那么幸运了，元刊本存留下来的甚少，《永乐大典》虽收入甚多，然明清两代藏之于内府，没有刊行传世，近世随着其书的散佚而大都没有存留下来。宋元南戏还好一点，除幸存《小孙屠》等三种外，尚可知三十多种戏目，研究者可以借以考知其所演故事，从明人编制的曲谱中辑出若干残曲。最不幸的是平话，连作品名目都没有载录。现在存留下来的有建安虞氏刊行的《全相平话》五种和研究者考定为金亡前后所刊《新编五代史平话》，在文学史、小说史中也只能是做些介绍性的评述，对元代平话的总体面貌、成就和价值，还有待于做出更全面深入的认识。这不能不算是一件憾事，做点探佚性的研讨应该是不无裨益的。

首先应该说明一点，就是《永乐大典》所收录的平话并非只是“话”字部“平话”26卷所收录者。赵万里曾从“辽”字部辑出的《薛仁贵征辽事略》，就是一种没有题名“平话”的平话。《三国志平话》的另一个元刊本便题作《三分事略》，内容、版式基本一致。《东京梦华录》卷五“京瓦伎艺”记讲史书有“说三分”，即讲三国分争故事。《三分事略》之题名当早于《三国志平话》。赵万里在《薛仁贵征辽事略》排印本“后记”中说：“《永乐大典目录》话字韵共收宋元评（平）话二十六卷，此书疑亦其中一种。”此“疑”可能是不对的。《永乐大典凡例》中虽云“或事文交错，则彼此互见”，然所谓“互见”是相互参见，并非重复引录一文，研究者从现存卷帙中未曾发现重复引录一文者；《薛仁贵征辽事略》是以其所叙之事收录于“辽”字部中，纂修者未必视之为平话。如果这个判断属实，则《永乐大典》收录的平话便不只有那26卷所收录者，极其可能还有一些，只是现在不可能得知了。

《永乐大典》“话”字部“平话”26卷究竟收录了哪些宋元平话？

首先可以确凿认定的是现存的元建安虞氏刊《全相平话》五种，它们是《武王伐纣平话》、《七国春秋后集（乐毅图齐）平话》、《秦并六国（秦始皇传）平话》、《前汉书续集（吕后斩韩信）平话》、《三国志平话》。就这五种平话看，建安虞氏所刊当是一个平话系列，有“后集”必有“前集”，有“续集”必有“正集”，有“前汉书”亦当有“后汉书”。多位研究者依据《七国春秋后集》开头一段意在与《前集》相衔接的追述性文字，认定《前集》叙述的是孙、庞斗智故事；依据《前汉书续集》开头一段是“时大汉五年十一月某日项王自刎而死”云云，认定《正集》叙述的

是刘、项争雄故事。这一系列的题名“平话”的书，刊行于元代至治（1322~1323）前后，即便止于三国时代，至少也该有近十种，应该全都收载于《永乐大典》“话”字部“平话”26卷中。

又，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卷一“宋元部讲史”著录《吴越春秋连象评话》：“未见，见日本毛利家藏书目。”此书至今没有人见过，但孙先生当是见过毛利家藏书目，研究者也信其为实有。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话》第十七章《关于讲史》便据之著录云：“从书的题名来看，疑亦是建安虞氏所刻的一种。本书命名，一望而知其所叙是春秋末期吴越两国争霸的故事。它所依据的蓝本，必为现存的《吴越春秋》。”此本平话未必是建安虞氏所刊，今存虞氏所刊平话均标作“全相”，何以独此平话例外，标作“连象”？然春秋末期吴越争霸的故事，也是历史上的一段热门话题，虞氏所刊平话系列大概不会没有这本《吴越春秋》的，《永乐大典》也不会不收录于“平话”卷中。

现存《新编五代史平话》（其中《梁史平话》、《汉史平话》缺下卷），研究者考定为金亡前后刊行。宋元人记艺人讲史书，往往是“三国”“五代”并称。《东京梦华录》卷五“京瓦伎艺”条记有“霍四究，说三分；尹常卖，五代史”。《三朝北盟会》卷二四三引苗耀《神麓记》记说书人刘敏为金贵族完颜充说“五代史”事。杨维桢《送朱女士桂英演史序》称女讲史艺人朱桂英“善记稗官小说，演史于‘三国’‘五季’”。“五季”即指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五代的兴替既是宋元讲史中像“说三分”一样的流行节目，有讲史话本流传并刊行，并收入《永乐大典》中的“平话”中，也是合乎情理的。

近世研究者还从古朝鲜的《朴通事谚解》一书中，发现元末明初有两种称作“平话”的书，一是《赵太祖飞龙记》，一是《唐三藏西游记》。《朴通事谚解》正文中引录了《西游记》平话中孙行者在车迟国与伯眼大仙斗法的故事，与百回本《西游记》小说情节基本一致，只是文字较简略；另外还有几条注文，其中一条概述唐僧取经经历的灾难，提到的有数十处，顺序与百回本小说不同，却都是百回本小说的重要情节。《永乐大典》“梦”字部引录了“魏征梦斩泾河龙”一段，开头标明摘自《西游记》，与百回本小说第十回所叙基本一致。《永乐大典》馆臣采录了《西游记》平话里的这段情节，“话”字部“平话”卷里也有可能收录了这本平话的全文。

《赵太祖飞龙传》，就名目看无疑是演绎宋太祖发迹变泰成为开国皇帝的故事。元代通俗文艺多称赵太祖。罗烨《醉翁谈录》所举话名目中有《飞龙记》。这本平话后世不见传本。清乾隆间刊《飞龙全传》，卷首吴璿序称它系就一部“虚妄无稽”、“词浮泛而俚”的旧本删定而成。书中是“历史人物与传奇人物捏合在一起”（柳存仁《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中语），“旧本”当是已往传说的文本，或其原始便是这本平话。这本平话亦有可能采录入《永乐大典》“话”字部的“平话”卷中。

以上是就现存的几种平话和现已不存却有文献可知其曾有的平话做出的判断，理由至为简单，也毋庸置疑：《永乐大典》将“平话”像“戏文”、“杂剧”一样地作为一种文类，收录作品二十余卷，明白题名为“平话”的作品，例应收录。虽然其间有所选择，不必是一一照收。

宋元讲史讲述“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战争之事”，几乎是宋前的各代历史都有“话”可说，还有宋代的如《中兴名将传》的“新话”，讲史话本应当是很多的，元代刊行的平话也应当不少，否则，便不会引起《永乐大典》馆臣的重视，列为一种文类，置二十余卷的篇幅，采录相当多的作品。现存的和有著录的平话之外，这26卷中还有可能有哪些平话呢？

现存的几种平话被发现以来，研究者大都注意到了它们与明代的历史演义小说及其变种神魔小说的传承关系，经过对读揭明：罗贯中的《三国志演义》“还在保存了一部分平话的旧事（故事情节）而大加增饰”（郑振铎《三国志演义的演化》）；《封神演义》前30回，“除哪吒出世的第十二、三、四回外，几乎完全根据《平话》来扩大改编”（赵景深《〈武王伐纣平话〉与〈封神演义〉》）；《两汉开国中兴传志》“第三卷自项羽自刎于乌江后，以迄第四卷尾文帝即位止，情节与元刊本《前汉书续集》相同（文字与插图，稍有相异之处），说明此书是继承虞氏所刊平话系统的”（《中国古代小说总目白话卷》“《两汉开国中兴传志》”条引王古鲁语）。有研究者还由此推断已佚平话的内容。程毅中说：“明人黄化字所校正的《两汉开国中兴传志》，从《楚王独奔乌江自刎》到《三王诛吕立文帝》的11回，基本上就是承袭《前汉书平话续集》而来的。前面楚汉争锋的部分，很可能就是《前汉书平话》正集的内容。后面讲东汉故事的部分，也可能有《后汉书平话》的遗响。”（《宋元小说研究》第九章《宋元讲史平话》）戴不凡将《五代史平话》与明刊《南宋志传》对勘，发现后者是在前者的

基础上，自《晋史平话》处开始略加改写，最后宋灭南唐的部分才不是平话所有的，并且在相应的地方找到了《五代史平话》的部分佚文（《小说闻见录·〈五代史平话〉的阙文》）。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卷三“明清部二”著录明刊《孙庞斗志演义》，便论断“其作风实与今存元刊诸平话为近，与《春秋后集》沆瀣一气，疑即出于元人《七国春秋前集》。即以一书视之，亦不至于大谬”。

研究者相继做出了这类研究，综合起来便凸显出明代大宗的历史演义小说的一个基本情况，即它们大都是就宋元讲史平话改编而成的，许多宋元讲史平话或整体或部分地经过程度不同的改写、增饰而存留在明代大宗的历史演义小说的肌体中，自然也是可以追踪、探佚的。

首先想到的是，戴不凡通过对勘，发现明嘉间刊行的《南宋志传》原是整后《五代史平话》的《晋史平话》以下部分和采自他书的宋灭南唐的内容而成，那么与之并出的《北宋志传》是依据什么编成的？其书第一回“按语”有“收集《杨家府》等传，参入史传年月编定”之语，这里所说《杨家府》，柳存仁认为并非万历年间刊行的《杨家府演义》，它与《北宋志传》“实在就是一书”，而是“现在未见过”的另一种“刻本”（《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玉茗堂批点绣像南北宋志传》”条）。《醉翁谈录·小说开辟》有《杨令公》。《北宋志传》所据之改编的《杨家府》，十之八九是一本元刊平话，或即题名《北宋志传杨家府平话》。

嘉靖年间刊行的《北宋中兴英烈传》，讲说岳飞精忠报国故事。熊大木序中说“武穆王《精忠录》，原有小说”，“稗官野史实记正史之未备”，“史书小说有不同者，无足怪”，“两存之以备参考”。这部说岳传就是依从所谓“小说”叙事，而于其中插引大量的诏令、奏章、书札、诗词。《梦粱录》卷二十“小说讲经史”条，记南宋咸淳年间有说话人说《中兴名将传》，也就是《醉翁谈录·小说开辟》里所说“新话说张、韩、刘、岳”，也该有讲史话本传世。书坊主人熊大木这部小说所依据的“小说”《杨家府》，也当是一种平话。

熊大木编刊的小说还有《唐书志传》，叙述李唐开国故事。卷首李大年序以《三国志》、《水浒传》为证，谓此书虽“似有紊乱《通鉴纲目》之非”，然其“未必无可取”。所谓“紊乱《通鉴纲目》”，是指书中所叙情节，虽一依《通鉴》，但也间有时序的错乱，采自传说而与史实不合的内容。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著录此小说，举窦建德破宇文化及

与尉迟恭战美良川二事，认为“当为臆说”，“自元人已艳称，兹所叙述，虽至粗鄙，然亦活泼”。所谓“臆说”当非熊大木所造，而是本之于一种文本，那种文本自然是一种平话。

以上据明嘉靖间熊大木编刊的几种称名“志传”的历史小说，推断所依据的是元刊平话，是因为它们编刊的时代早，地点为刊印平话的建阳书坊，有刻印通俗读物的传统、工艺条件，也存有原刊平话的雕版和文本。熊大木短短几年便刻印几种小说，便说明了这个问题。陈大康在《明代小说史》里称这是由《三国志演义》、《水浒传》刊行引发的“通俗小说创作的重新起步”，编撰也效法《三国志演义》取史书采小说“按鉴演义”的方式，这也构成了这一时期历史小说的共同特征（第八章《通俗小说创作的重新起步》）。这些小说所采用的“旧本”，也只能是元代刊印、明初仍在流行的平话，其中也程度不同地保存了那些平话的内容和特点，只是现在无法清楚地分辨、剥离出来。《永乐大典》“平话”卷中，应该有所收录；虽然不必是全都收录。

口述史小说的演变和功能

○扬州大学 董国炎

一 口述史小说的生存土壤

中国是史官文化的国度，很多小说兼有口述史的特点，可以称之为小说口述史，或者口述史小说。口述史小说的内容特点、形式特点，和一身而二任的独特个性，不是偶然出现，而是中国历史文化土壤所生成。中国史官文化的影响遍及社会各人群，遍及社会文化生活各领域。中国文化的基本话语常有“历史叙事”色彩，这是口述史小说的生存土壤，是深层社会文化原因所制约。温带大陆农耕生产具有稳定性和有序性：四季有序，万物有节；应时而动，顺天而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制约人们的思想和思维习惯。血缘宗法制继承关系强调男女之别、嫡庶之别、长幼之别。大到国家，小到部族、家族，都特别在意自己的“根和直根、系和主干、枝和旁枝”。皇帝祭太庙，百姓祭祖，昭穆不混，统绪不乱。在中国，皇权与神权统一，皇权制约神权。重视此岸世界，轻视彼岸世界，重视真实可信，轻视玄虚幻想。老一辈谈话每每以“从前”开头，喜欢从古说到今。国人对“历史叙事”，有深层认同和依恋，有各种无师自通的表述方法。

诸子百家都努力讲述历史，同时批评其他各家讲述的历史。儒家、法家、道家、墨家等等，都展开自己对历史的描述，都把自己的政治理念融入历史叙事，同时批评别人的历史描述。围绕对历史的不同描述，斗争异

常激烈。对孔子杀少正卯、孟子辟杨朱这些事情，儒家有自己的描述，其他派别也有自己的描述。围绕孔子生平大事，孔子与盗跖的关系，《庄子》有不少丑陋的记载，但是遭到儒家激烈否定。儒家说《庄子》出于虚构，是小说家言。不过道家仍然可以坚持自己的说法。

其他门派逐渐消亡，儒家独尊以后，旧的门派争论走向消沉。但围绕重要的历史叙述，新的观点冲突依然激烈。比如周武革命与伯夷叔齐的态度；比如以庶夺嫡、以幼夺长、以夷变夏、牝鸡司晨等等特殊的民族、政治或伦理现象，都可能受到一派人激烈批评；但另一派人表示理解。儒学内部的历史叙事，也出现明显差异，比如今文经学派和古文经学派的历史叙述明显不同。而各个民族的历史叙述，存在更大差别和对立。围绕着不同的历史叙述，还发生过残酷的文字狱大案。

各文化部类都主动与历史联姻，稗官小说更主动靠拢历史，从一开始就显现出对历史的叙述热情。正统史学家批评他们的故事依托虚诞，也许这正是口述史小说独特的阐释。

古人常说：史失而求诸野。主要是求诸稗官小说、田夫野老。稗官小说有一个特点：小说家讲述的历史，其他各派最多轻视而已，但严厉敌视不多。因为小说家没有固定的社会蓝图和政治纲领，不容易为了观念而系统编造历史，不容易成为各家各派严厉攻击的对象。小说家讲述历史，来源是道听途说，街谈巷议，真实程度可能有变形，阐述更不够专业，但是小说家的民间立场，是显而易见的。民间立场决定：小说家讲述的历史，体现了民间意识、民间趣味。这种独特性正是其价值所在。不同时代，都有人喜欢这种独特的历史故事。这正是小说口述史存在和发展的文化土壤。

对早期小说的主要形态，班固《汉书·艺文志》做过一个总体概括：“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这明显表明早期小说形式方面的口述特点。而内容方面，早期小说的最大特点就是对历史的兴趣，对历史的依附。内容形式两方面结合，构成早期小说的口述史特征。

《汉书·艺文志》共著录小说 15 家，1380 篇。从这 15 家小说的名称来看，这些早期小说的性质可以称为讲史小说。它们都是直接以历史人物或者朝代名称作为小说题目。这 15 家中篇数最多的一家《虞初周说》有 943 篇，按语曰：“河南人，武帝时以方士侍郎，号黄车使者。”这位作者

虞初在汉武帝时担任郎官，所谓黄车使者，可能与巡行民间、采集故事的职务有关。小说全名恰好表示：这是由虞初采集和讲述的周朝的故事。这种小说里，口述史的成分可能占很大比例。

早期小说被整理加工、写定文本的过程，也是口述史创作受到正统文人改造的过程。他们采取按语或者小注的形式，对这些小说作出言简意赅的批评。例如《伊尹说》，按语云：“似依托也。”《周考》，按语云：“考周事也。”《青史子》，按语云：“古史官记事也。”《务成子》，按语云：“称尧问，非古语。”《天乙》，按语云：“天乙谓汤，其言非殷时，皆依托也。”《黄帝说》，按语云：“迂诞依托。”

这些按语基本都是针对历史真实性而发，对小说中虚诞依托的“历史描述”，做出严厉批评，实际把历史真实性看做衡量小说地位的首要标准。班固等人这种态度，体现了正统史学家立场，这影响到后来的文人小说。文人小说对历史人物和重大事件，避免明显的虚构，而在当时认为真伪难辨的领域驰骋想象。魏晋六朝文人创作了一批有关汉武帝的虚构小说，还喜欢托名班固。这批小说如《汉武帝内传》、《汉武帝故事》、《汉武帝洞冥记》之类，描写汉武帝好神仙，千方百计谋求与神仙见面，却往往自讨没趣，受到神仙的批评斥责。这类小说喜欢托名班固，坚持把虚幻的故事强加给正统史学家。

唐代以后，讲唱文艺日渐发达，在讲唱文艺基础上产生的宋元平话小说，在宋元平话基础上形成的明清评话小说，都保持着口述故事的鲜明特色。这些与讲唱文艺有密切联系的通俗小说，形式方面与“口述”有紧密联系，保持大量说书人的专用术语。如果内容方面能够反映真实的历史，那就具有“口述史”作品的主要特点。明清小说口述历史，在倾向性方面独具特色，能够反映与官方文献不同的历史真相；而且富于民间色彩，对民风民俗和普通社会生活很感兴趣。有不少作品对当时的“近现代”历史兴趣浓厚，经常根据传闻甚至个人经历叙说历史，很多说书人叙说发生不久的重大事件，生动翔实，经常与官方文献有明显差别。

二 口述史小说对题材的两种处理

面对重大题材，口述史小说采取两种处理方式。一种是变形处理，这往往涉及特别敏感的政治大事、朝廷要人，甚至帝王本人。这类问题历史

著作不敢记载，或者严重歪曲变形。小说采取真实与虚幻相结合的方法，还能够保留一些真相。举凡宫廷权力斗争、朝廷党争、宦官干政等重要问题，小说中有不同反映。这方面重要小说如《唐太宗入冥记》，意义非凡。唐太宗为夺取帝位，杀掉自己的哥哥李建成，及弟弟李元吉，还囚禁了父亲李渊。但诚所谓胜者王侯败者贼，正史文献把他描绘成慈祥仁爱的圣明之主，受到全方位肯定。然而在民间叙事中，他残杀亲人的历史并不能抹杀。敦煌讲唱文学写卷中保存《唐太宗入冥记》，以离奇的变形形式，讲述唐太宗杀害亲人登基之后的遭遇，描绘唐太宗的阴暗心理与手段。故事讲：唐太宗登基之后，灵魂被捉到阴朝地府，受到追查审问。看到地狱中罪犯受刑罚惨状，他心中很害怕。判官告诉他，捉他的原因是他两个兄弟的冤魂日夜啼哭，苦苦告状：“二太子在来多时，频通款状，苦请追取陛下。称诉冤屈，词状迫切，所以追到陛下对直。”

这个判官有一些很具体的审问：“问大唐天子太宗皇帝：去武德七年，为甚弑（杀兄）弟于前殿，囚慈父于后宫？仰答！”这与其说是尖锐的问话，不如说是直接的指责，而且还命令皇帝抬起头来回答。敦煌讲唱文学敢这样对待唐朝开国皇帝，体现了强烈的批判精神。阴间故事看上去荒诞，但披露了重要的历史真实。唐太宗无法回答审问，更不敢去和兄弟鬼魂对质。他依靠对判官大肆行贿，为阳世的判官家族提供好处，打动判官私心，侥幸逃脱回去。这样处理也是合理的，如果只求痛快，把唐太宗打入十八层地狱，则将与唐太宗做皇帝很久的历史事实严重不符。而且，揭露判官的肮脏自私心理，揭露无所不在的行贿受贿，别具另一种深刻。这个卷子前后俱有缺失，“入冥记”这个中性名称是王国维拟定，一直沿用。也许本来名称更为尖锐。

另一种处理方法是真实描述，堪称真实可靠的历史记载。这种真实描述的作品，突出真实情节，记录具体的人名、地名、各种数据。通篇没有多少艺术虚构，好像缺少艺术吸引力。但是通过讲唱文体韵散结合的方式，抑扬顿挫，描绘渲染，也提高了艺术吸引力。敦煌变文有《张义潮变文》、《张淮深变文》，可以称为这种类型的重要作品。这种作品可以看做小说，学术界已经广泛接受。晚唐时期，西部广大地区沦陷于少数民族政权。甘州、肃州、凉州、瓜州、沙州五郡，苦难深重，与朝廷隔绝将近百年。其中唯有敦煌所在的沙州地区，张义潮、张淮深领导百姓，组织军队，捍卫家园。他们奉行唐朝正朔，与朝廷取得联系，重现中华衣冠文

明。前一变文描写西南方吐蕃兵马前来侵掠沙州，张义潮带兵迎击。敌军在西同地方败退，张义潮追击千里，生擒敌军宰相三人，俘获三百余人，夺得驼马牛羊二千余头。敦煌以北千里的伊州地方，常受回鹘与吐谷浑之害：“频来抄劫伊州，俘虏人物，侵夺畜牧，曾无暂安。仆射乃于大中十年六月六日，亲统甲兵，诣彼击逐伐除。”张义潮长途奔袭，突然攻击，大获全胜。这篇变文反映当时沙州战事，战斗日期和经过，俘虏人数，缴获牲畜种类和数量，并无夸饰之风，令人感觉非常可信，简直堪称信史。出于讲唱文艺，迅速传播，振奋人心，当刮目相看。

《张淮深变文》讲述张淮深继续领导沙州保卫战争，战果累累。他主动派使者去朝廷，迎来朝廷使臣。他带领使臣在沙州开元寺拜谒唐玄宗像，大家想到国家今昔盛衰，想到沙州地区百年历史，不胜感慨伤怀，也激起当前欣慰和保卫家园的决心。这番历史描述，不满足于流水账式的陈述，而相当深刻地表现了沙州领导人的心理状态，有了若干心灵史的描述，因而很难得。

三 口述史小说风格的改变

宋元平话中，讲史类是最重要一大类。其中，当时的“近现代”历史很受重视。早在东京汴梁，就有专门说五代史的说书人。在可分可合的梁、唐、晋、汉、周《五代史平话》中，常有一些人物、事迹和重要言谈“于正史无征”。例如《梁史平话》中，黄巢在长安参加科举考试的情况；黄巢与尚让在起事之初的经历；朱温不满意黄巢杀戮洗城并且贪婪财物的做法；朱温对黄巢不愿“放散赏军，军有怨言”的形势加以利用；朱温发展壮大实力的过程。其中有很多叙述是独特的。对刘知远、郭威、柴荣等开国君王的描述，在家世出身、个人早期经历方面，常有不见于新旧《五代史》的独特内容。这些描述，风格质朴，感觉很真实，可能源于民间流传的口述历史。

《大宋宣和遗事》叙述宣和年间许多事件和人物。材料既来源于各种史乘、文人笔记，也来源于社会传闻和民间艺人。这部书的编辑撰写比较粗糙，在文体方面，呈现多样风范，从各部分的文笔往往能够看出来。源于史乘和笔记者，多抄录或者改编原文，很多是文言文，可以寻求原著加以印证。源于社会传闻和民间说法者，文字水平不高，却通俗生动，常

有非常真实的记录，还有大量记录口语。例如早期“水浒传”部分，杨志卖刀杀人被发配，在押送路上——

正行次，撞着一汉，高叫：“杨指使！”杨志抬头一觑，却认得孙立指使。孙立惊怪：“哥怎恁地犯罪？”杨志把那卖刀杀人的事，一一说与孙立。道罢，各人自去。那孙立心中思忖：“杨志因等候我了，犯着这罪。当初结义之时，誓在厄难相救。”只得星夜奔归京师，报与李进义等知道杨志犯罪因由……

再如晁盖智取生辰纲之后，公差侦破案件，捉住酒店老板审问——

花豹依实供吐道：“三日前，日午时分，有八个大汉，来我家里吃酒，道是往岳庙烧香，问我借一对酒桶，就买个酒去烧香。”张大年问：“那八个大汉，你认得姓名么？”花豹道：“为头的是郓城县石碣村住，姓晁名盖，人号唤他做铁天王……”

以上情节不见于其他记载。这种生活化口语化的文字，在《宣和遗事》全书中显得“与众不同”。其实这种风格变化与口述历史的题材变化正相吻合。以往的口述历史，被叙述的对象主要还是帝王将相。宋元时代口述历史中，最喜欢述说草莽英雄发迹变泰的故事。《五代史平话》中，主要叙述后来成为帝王将相的人物。早期“水浒传”故事中，大量描绘草莽英雄、民间好汉，口语叙事更为真实。语言变化带来艺术风格变化，整个故事更为生动粗犷。叙事节奏变成快慢搭配，有时重现口语原貌，详细描绘说话语气；叙事更为跳跃自由，速度较快。口述历史对白话小说艺术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宋元讲史平话，在理论层面表现出自己的“现代意识”。南宋罗烨《醉翁谈录》中《小说引子》一篇，载有一首讲史所用的开场唱词。唱词末四句云：“唐世末年称五代，宋承周禅握干符。子孙神圣膺天命，万载升平复版图。”这段唱词重视历史的延续，强调南宋政权的正统性，坚信他们必定收复失地，恢复版图。这种强烈的政治意识贯注于讲史平话，使南宋讲史平话特别关注“现代历史”。据吴自牧《梦粱录》载，咸淳年间讲史平话艺人王六大夫原是御前说话人，他演说的《复华篇》、《中兴名将

传》等书目，在当时最受欢迎。南宋被称为中兴名将者，大致包括韩世忠、张浚、刘琦、岳飞等人。他们的事迹传播社会，受人敬仰。朝廷和民间对他们评价不同，特别对岳飞的看法，大概很不相同。平话的性质，是非常重要的口述史著作。

四 明清口述史小说的两种功能

明清小说“口述历史”成分很多，原因是通俗文艺消费市场已经形成。因为口述史小说受到欢迎和重视，出现了很多实用主义的直接利用。《英烈传》讲述明朝开国君臣故事，故事中郭英在鄱阳湖大战中射死陈友谅，对朱明政权最终获胜，功劳很大。嘉靖间郎瑛《七修类稿》极力称赞郭英。他特别指出：这件事情史官失载，应该称赞《英烈传》保存史实的功劳。然而万历年间沈德符《野获篇》却说，是郭英的后人武定侯郭勋为了个人目的而伪造历史，并且安排编演《英烈传》，“令内官之职平话者，日演唱于上前，且谓此相传旧本。上因惜英功大赏薄……”于是郭勋得到很大好处。

万历年间因为征讨播州（今贵州遵义一带）战事，发生四川巡抚李化龙与贵州巡抚郭子章的矛盾。矛盾的关键是对这场战争中，二人功过是非的记载不同。李化龙及其手下利用评话小说，郭子章则汇编材料，撰成野史，互相攻击指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五十四郭子章《平播始末》提要说：

万历间播州宣慰使杨应龙叛。郭子章方巡抚贵州，被命与李化龙同讨平之。子章尝有《黔记》，颇载其事。晚年退休家居，闻一二武弁造作平话，左袒化龙，饰张功绩，多乖事实。乃仿纪事本末之体，以诸奏疏稍加詮次，复为此书，以辩其诬。

李化龙一派的平话指《征播奏捷传》小说，有四川佳丽书林刊本。卷首小引称赞此书“观其言事论略，皆有根由事迹，悉同之蜀院发刊《平播事略》……”蜀院发刊类似于地方政府简报，应当也是可靠的。我们无意分析上述人物的是非功过，以及这部评话小说的可靠性，只是注意一些人对“口述历史”的特殊态度。口述史小说有可能受个人目的左右，成为主要

弊端。晚明时期，表现当代历史的小说明显增加。围绕反对魏忠贤阉党的斗争，围绕辽东战局，围绕地方重大事件，都有所谓纪实小说很快出现。动机不一，真伪并存，艺术水平也有高低。这些作品、这种文学现象，都很值得研究。

例如松江地区出现的《黑白传》评话，真实又迅速反映当地大乡绅、同时也是著名文人董其昌横行不法、好色无耻的情况。这部评话还引发激烈的群众斗争，是难得的社会史料。所谓黑白，指松江乡绅董其昌和陆兆芳。董其昌是著名宦宦文人，号思白。陆兆芳只是普通乡绅，他生得脸黑。董其昌势力很大，横行乡里。他看中陆兆芳家的侍女绿英，竟指派儿子带领二百多人到陆家大打出手，抢走绿英。当地舆论普遍指责董其昌，随即出现评话小说《黑白传》。此书以这“黑白”二人为主要人物，以品评无赖恶棍的口气，调侃嘲骂，把董其昌说得极其不堪。这书不胫而走，到处评说。董其昌恼羞万状，抓来他怀疑是小说作者的范某人，私设公堂拷打，致使范某屈死。事情激起民愤，松江等地百姓，无不欲杀董其昌而后快。外地来松江的各类商人、船夫和三教九流都参与斗争，揭露材料传播很快很广。随后出现的《民抄董宦事实》云：“以致徽州、湖广、川陕、山西等处客商，亦共有冤揭粘贴，娼妓龟子游船等项，亦各有报纸相传。真正怨声载道，穷天罄地矣。”最后大批民众冲进董宅抄打，董其昌一家狼狈逃走，民众火烧董宅。此事可参看1964年6月2日《人民日报》，冶秋文章：《民抄董其昌一案述略》。在整个事件中，评话小说口述当代历史，迅速反映社会重要事件，起了很大作用。

清代社会风气、学术风气与明代有很大不同。加之统治者的控制，都影响到口述史小说的发展。总体看来，清代口述史小说不够发达，但是在清初、清末以及思想文化控制相对宽松的时期和地区，仍然产生了不少口述史小说。有些作品描写清兵入关之初，各地的反抗斗争，艰难曲折，屡挫屡奋。描述官员和士绅的态度、政权的更迭情况，都非常真实，正史中根本没有这种反映。清末苏州评话《张文祥刺马》，真实描述当时封疆大吏、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杀始末，直接驳斥了当时官方文献对刺客的污蔑，有珍贵的史料价值。也有一些作品，整体上口述史价值有限，但是部分记载非常真实，非常珍贵。例如三藩之乱时期，广东潮州汉军反叛朝廷的故事《刘进忠三春梦》小说。这部小说的战争描写，在中国古代战争小说中，绝对是一个另类，但却是真实可信的。在我们常见的战争小说中，